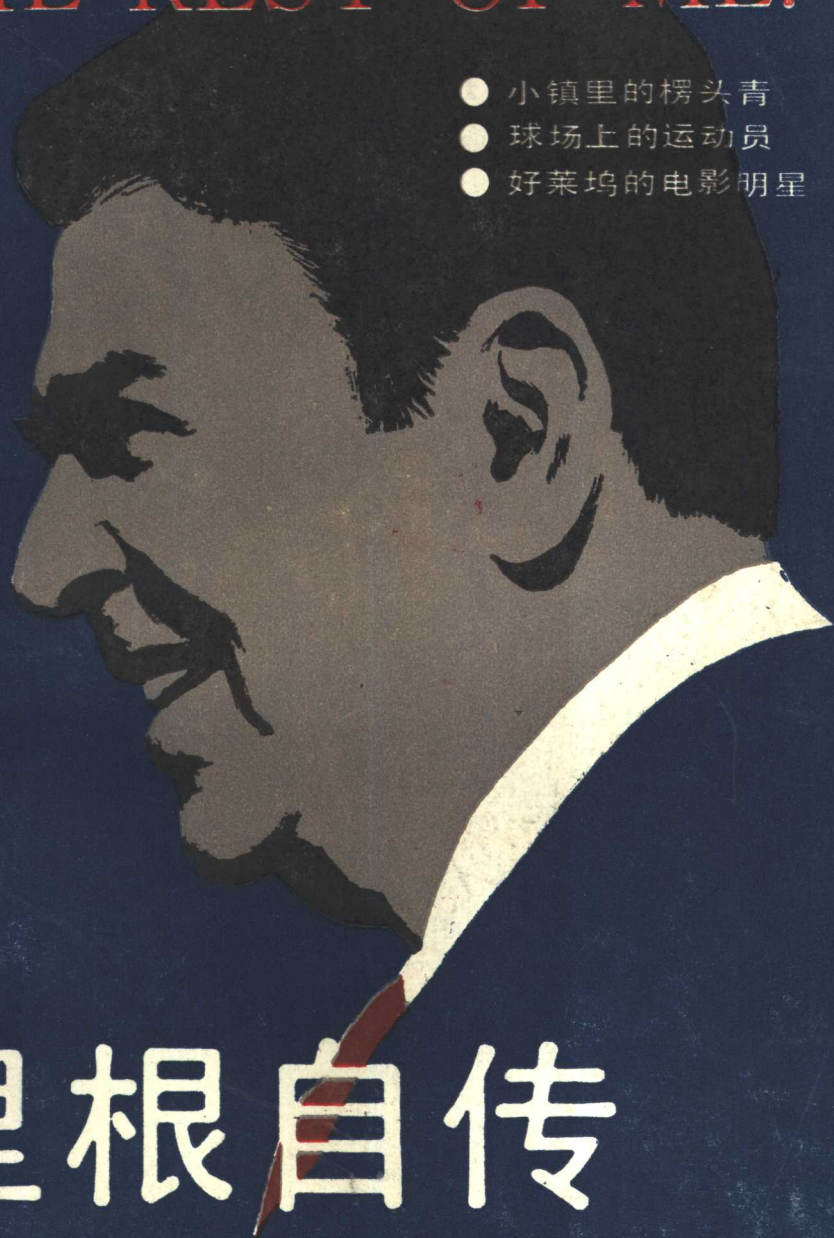


WHERE'S THE REST OF ME?

〔美〕罗纳德·里根著
李士洙 夏庚荪等译

- 小镇里的楞头青
- 球场上的运动员
- 好莱坞的电影明星



里根自传

——我的其余部分在哪里？

〔美〕 罗纳德·里根著
李士涿 夏庚荪等译

里根自传

——我的其余部分在哪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梁 珊

责任编辑 周德均

Where's the Rest of Me?

据 First Karz Publishers Edition, 1981年版译出

里 根 自 传

——我的其余部分在哪里

[美] 罗纳德·里根著 李士涿 夏庚荪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48000 印数00001—14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060-X/1.59 定价: 2.50 元

出版说明

国内关于现任美国总统里根的传记著作已陆续有所介绍，但大多出自他人的手笔。为了给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研究、了解里根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特此翻译出版了《里根自传——我的其余部分在哪里》一书。

本书是里根于1965年所撰的自传，其时他已出任州长。这部自传反映的主要是里根从政前的生活经历。由于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书中出现了一些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以至攻击的言论。为了保持自传的真实性，我们在出版时未作删节，相信我国读者自能正确对待。

浙江文艺出版社

第 一 章

这个故事是从一个小孩的屁股的特写镜头开始的，发生在1911年2月6日伊利诺斯州的名叫坦皮科的小镇上。当时，我哭得脸色发青，屁股给打得通红。我父亲后来声称，当他颤抖地说出下面的话时，连脸色都发白了：“这个小不点儿的胖‘荷兰崽’，他竟然吵闹得这么厉害！不是吗？”

“可我觉得他是挺惹人喜爱的，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母亲虚弱地应道。

这是我的双亲对我的最初看法。据我所知，他们终生再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见解。至于我，从一出生就被赐予了“荷兰崽”的雅号。并且我确实特别喜爱那展现出来的——红的、白的和蓝的颜色^①。在各种场合，每当我有一种想挥动带有这三种颜色的东西的强烈冲动时，我就心花怒放。我曾听到不止一个精神病学家说过，我们是从母亲的乳汁里汲取我们的理想的。那么，我必须强调，我吮吸的乳房，正是一个培育勇敢孩子和自由信念的摇篮。我是家里最会闹肚子饿的，不过只要我在带栏杆的小木床里一吵，就会被喂得脸色红润、肚子鼓鼓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不咬栏杆便吮手

^① 荷兰、美国国旗均为红、白、蓝三色所组成。

指。这吮拇指的习惯始终缠绕着我，而且，它象征性地保留在我的一生中。

在早年生活中，我相信自己过的是一种十足的里根家的生活。任何一个爱尔兰人，一般都非常懂得怎样去生活——当他对此坚信不疑的时候，他往往是正确的。直到30年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部分年华已经虚度。我的这一感觉是在1941年华纳兄弟公司^①拍摄《金石盟》这部影片时才产生的。我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使我一跃而成为电影明星。

根据亨利·贝拉曼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金石盟》，确实是我演过的最佳影片之一。它是一部关于一个小镇上的小人物的故事。我对其人其事并不陌生，情节略带悲惨意味，却很令人感动。我扮演的德雷克·麦克休一角，是个寻花问柳的花花公子。随着剧情的发展，“我”继承的一大笔可观的遗产都被一家银行的老板席卷一空，逃之夭夭。我把这个上层社会贵族阶层的落魄生涯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的一场重头戏是在一张床上表演的。这个场景是情节发展的结果。“我”在铁路车场的一次事故中受了重伤，立即被送往一个虐待成性的医生那儿（他竭力反对“我”与他的女儿幽会，并感到出于他的职责，必须惩罚“我”）。当“我”在楼上的一间卧室里恢复知觉时，才发现医生已把“我”的双腿齐大腿根处锯掉了。

要把这一瞬间突如其来的震惊神情刻画出来，难度实在太大了。从毫无意识一下子跳到完全明白那几秒钟内所发生的一切，向我提出了自我从影以来最富有挑战性的表演问

^① 美国八大电影制片公司之一，由华纳四兄弟于1923年创立。

题。最糟糕的是，我还必须在不超过九个字的一句台词里对此作出反应。

对这样一场戏，即使是一个非常老练的演员，也会感到相当棘手；而要求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获得应有的戏剧感染力，那简直是件要命的事。我感到，自己一无经验，二非天才，难以进行这种即兴表演。由于我缺乏被人截肢的实际体验，我不得不去捕捉那真实的感受。

因而，在镜子前，在摄影棚的角落里，在驱车回家的路上，在餐馆的厕所内，在我要好的一些朋友面前，我不得不反反复复地练习这场戏；有时夜半从梦中惊醒，也会凝神望着天花板，并在重新入睡之前喃喃自语，嘟哝着那句台词。我请教了许多外科医生和心理学家；甚至同残疾人交谈，试图用他们的感受来点燃我的情感之火，借以了解：当一个人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醒来时，猛然发现自己身体的一半已经失去时，究竟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得到许多回答。我还为自己的感受增添了某些东西。我的意见同他们的全都不同，虽然他们的意见也都互不一致。我被化装成残废人。随着开拍日子的渐渐逼近，我开始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之中。

拍摄前的一天晚上，我夜不成寐。当我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地出现在拍声片的舞台上时，对于怎样念那句台词，心中仍然茫无头绪。我信心不足，无可奈何地将化妆品粘贴一番以后，穿上睡衣，漫步去看看道具是个什么样子。我发现道具工人安排了一个巧妙而出色的花招：在百衲式的盖被下面，他们在床垫上挖了一个洞，再在下面放了一个箱子作为支撑。我凝神望了一会儿，一种压倒一切的冲动立即驱使我

爬进了那副设备。我就这样僵卧在床上整整有一个小时，一面眼睁睁地望着我那残缺的躯干和难以瞧出破绽的柔滑平坦的被子，一面思忖着，那下面本该是我的双腿吧？

渐渐地，事态的发展使我惊慌起来，我感到一件可怕的事不可思议地降临到我的身上。稍后，我慢慢地发觉全体工作人员已经静悄悄地聚集在一起，摄影机已经到位，摄影场上的灯光也已就绪。站在我旁边的导演萨姆·伍德，瞧着脸上不时沁出汗珠的我。

“可以开拍了吗？”他低声地问道。

“不排练一遍吗？”我请求着。不知怎么，我心里已经明白，正式拍摄肯定要开始了。

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安息——他真是位了不起的导演！他马上转向全体人员，说：“让我们开始吧！”

“灯光！”“请安静！”等叫声立时响起。我躺下来闭上眼睛，紧张得如同绷紧了的琴弦。我听到萨姆低声地命令：“开拍！”刺耳地“卡啦”一声，标志着拍戏已经开始。我神志恍惚地睁开眼睛，环顾四周，然后让视线缓缓向下移去。直到现在我还不能描绘出，当我试图寻找我的双腿该在何处时，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兰迪！”我高声叫道，饰兰迪的安·谢里登（愿上帝赐福于她）冲进门来。当时她没有镜头，按照通常的安排，她也不需在场，除非镜头转过去，要她出场。但是，她知道正是在这一场戏中，男演员需要他所能获得的一切帮助。而在我心目中，此时此刻，她就是回答我呼唤的“兰迪”。我问道——那句折磨了我好多个星期的台词——“我的其余部分在哪里？”

镜头没有重摄。这场精彩的戏就这样成功了。以后我在

单项镜头中，也许再也没有过如此出色的表演。其原因是，我当时已竭尽所能地将自己与剧中人融为一体了。5年以后，在演戏之外的其他各种场合，我也必须向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我的从影生涯向我证明，在揭示什么是演员的生活真谛方面，再也没有一句台词能给我以如此深刻的印象！

于我们这一行的，需要运用那许多的虚构手法，并扮演纯属于虚乌有的角色。可以说，一个演员，只要他醒着，就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想入非非和彩排、拍摄中度过的。我觉得，如果他仅仅是一个演员，那么他就很像《金石盟》中的“我”，不过是半个人而已，不论他有多么超乎寻常的才干。我怀着一种最伟大的爱对待表演，而表演也确实为我创造了生活。但我体会到，表演容易使人陷入孤独，虽则这种孤独往往被人言过其实地认为十分了不起。在我的银幕生涯里，有高昂的薪水，到处受到赞扬，影迷们的信件络绎不绝，遐迩闻名，但我的活动天地也仅限于声片舞台，以及我的家庭和偶然在小镇里度过的一些夜晚，如此而已。我的社交圈子封闭了。出于工作需要，我有时一天工作长达14个小时，以致与我的兄弟尼尔也中断了联系，尽管他的住处与我的寓所相隔还不到半英里。

我开始感到自己像一个被隔离的病人，受着名声的保护。我从来就喜欢空间、自由的情感、广泛的社交和各种生活（其中当然包括出版）。而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创造别人笔底下的人物的半机械人，我在摄影场上的一举一动都只能按照别人的指示行事。在看样片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在银幕上绘声绘色的影子竟是我自己。

或许这就是我决定寻找“我的其余部分”的缘由吧。我

喜爱着三件事情：戏剧、政治和运动。并且我认为它们并不总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表示我的喜爱的。在这三项爱好之中，我是由电影圈走向世界的。至于体育运动，虽然我不再能出色地打橄榄球，但我仍旧可以游泳、骑马或观看竞赛。在电影电视这个行当里，我可以做到不仅称职，甚至还相当出类拔萃。可对于参政，我发现自己正处在平生最为混乱不堪的境地之中。

作为第一代血统的爱尔兰人，我有着爱好政治的倾向。在故土的许多子孙后代的血液当中，似乎都有某些布拉尼^①的成分，爱尔兰的近代政治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它使爱尔兰人具有嫩榭^②精神的热情。我曾经作为体育明星受到褒奖，又在电影界大获赞誉，但在政治界我深感自己遭到了误解、咒骂、诽谤、指责和讽刺。然而我以为，它却是我平生生活中最为迷人的部分。

我想，我参与公众生活的愿望，是我的父亲与母亲相结合的遗传因子所致。我父亲叫约翰·爱德华·里根（常被念成拉刚），是第一代从事工人运动的爱尔兰人。由于喜爱鞋子，他做过卖鞋的店员，管理过店里的鞋子部门，还经营过自己的鞋店。他学习过怎样推销更多的木底鞋的函授课程，曾经花了大量时间去分析研究脚骨的形状。如果不搞推销的话，他本可以干出更为出色的事业。可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加上他还有一个严重的嗜好，终于使他屡遭挫折，

① Blarney-green（巧言石），爱尔兰布拉尼城堡的石头。相传吻此石后，即能口齿伶俐动人。

② Shillelagh植物名，爱尔兰人用来鞭笞。嫩榭精神，指从事政治活动的热情。

一事无成。

第一次是在我11岁的时候。那一天，我回家时，发现父亲直挺挺地躺在前廊上。这时，除了我没有谁能助他一臂之力。他烂醉如泥，不省人事。我站在他面前足有一二分钟之久。我曾想走进屋去，立即上床，装做没有见到他在那儿。哦，我对他的嗜好，并非毫无所知。我已记不清我几岁时才懂得父亲偶尔不在家或在晚上大叫大嚷意味着什么。直到那时，只要有我的母亲内莉或者我的兄弟出面处理事情，我总是利用小孩子的那种特权躲在床上佯装熟睡。

但是，我认为，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个承担责任的开始（某些人会不承担责任）。如若不然，那就只能说我们仅仅是长大了，而不是成熟了。我为父亲的行为感到悲哀，同时也为自己感到难过。眼看着他的双臂伸出，如同钉在十字架上一概——他确实是那样的——他的头发与融雪浸泡在一起，鼾声如雷。尽管如此，我却对他毫无怨恨之心。

这该归功于内莉。虽然母亲痛苦万分，但是每当父亲偶尔与瓶子里的“恶魔”较量之后，她总是唠唠叨叨地对尼尔和我说，酗酒是一种“疾病”——我们应该热爱父亲，帮助父亲，而不要谴责他某些失去理智的地方。

我弯下身去，一股刺鼻的从非法酒店出售的威士忌的酒味，立即扑面而来。我一把抓住他的外衣，打开门，把他拖进屋内，弄到床上。不出几天，他又成了我所熟悉的、可爱的、永生难忘的、坦率而热情的人了。

杰克（我们都叫他的绰号）是个美男子，高个儿，黑皮肤，肌肉发达，个性充满矛盾。作为一个感情用事的民主党

人，他狂热地相信工人的权利，我至今还记得他激烈地追忆1922年赫林的那次战斗。那一次煤矿工人大罢工，有26人死于大屠杀。他从未放弃过人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活的信念。有一次在操场上，他正好看见我和别人打架，四周围着一圈怂恿起哄的人。他制止了这场殴斗，大声斥责那些围观者，然后用他鞋子的侧面把我踢飞地面一英尺之高。

“我这样做并非因为你在打架，”他说，“而是因为你没有获胜。”这就是我第一次认识大人的不公正究竟是怎样的，当时我已经胜利在望。

他坚信，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一个人的理想将决定他以后可能遇见的一切。他将他的这一原则付诸实践。有一部早期的经典影片《一个民族的诞生》来小镇放映时，只有我哥哥和我是仅有的没去看的小孩。杰克严肃地说：“那影片是讲三K党反对有色人种的，如果我家里有谁去看，我就不是人！”若干年以后，在经济大萧条的阴暗日子里，他试图到路上推销鞋子。他想寄宿在一个小镇的旅馆里。“好哇！”旅馆职员一边翻看登记簿，一边念着我父亲的名字，“里根先生，你会喜欢我们这儿的，我们是不让犹太人在这儿住宿的。”

我父亲又提起了皮箱。他狂怒地说：“我是个天主教徒，如果你们不接待犹太人，那么我也不住这儿！”因为那是镇上唯一的一家旅馆，他只得在他那停在雪地里的汽车中度过了一夜。他因此患了肺炎，没多久就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以后又数度复发，终于导致死亡。

他是个不知疲倦的人，雄心勃勃，一心渴望成功。在我17岁离家上大学以前，我们还从来没有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屋

子里生活过。直到20年以后，我才有能力把他接到好莱坞，交给他一份关于一幢小房子和一小块土地的无债契据。这是归他所有的第一笔不动产，也是我一生中馈赠给别人的最满意的礼物。

他具有尖锐的幽默感。他是我所听到过的一位最擅长说故事的人，特别是对那类在吸烟车上讲的故事尤为出色。但是，杰克总向我们说明，讲这类故事要注意时间与地点，并且在健康通俗的幽默与秽言淫词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别。直到今天。我也同意他的信条，并赞成他和马克·吐温的主张：美国幽默的基本形式之一，是普通大众的朴实的智慧，语言的规范与否也须看它是否具有真正的幽默感。

如果说我父亲是个道地的天主教徒，那么我母亲是个十足的新教徒；如果说我父亲心怀不满，向这世界挑战，那么我母亲却天生喜欢做好事；如果说我父亲是个标准的爱尔兰人，那么我母亲却是个典型的苏格兰—英格兰人；如果说我父亲有时粗俗不羁，那么我母亲却始终保持着—个家庭的优雅格调。也许母亲从来不明白，为什么父亲每年都要来一两次长达一个礼拜的狂饮，正像父亲始终不理解母亲的文化活动一样。可是，他们却相互容忍下来了。

内莉·威尔逊·里根，娇小的个子，赤褐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她确信每个人都爱她，那是因为她爱着每个人。我父亲的愤世嫉俗从未对她有过丝毫的影响，而我却在怀疑她的好心肠倒会改变他对世界的具体看法。除了受过小学教育之外，我的双亲谁都没有上过任何学校。在母亲看来，仁慈无需什么文凭，正如我父亲深信的那样：精力与勤奋才是成功所必需的唯一要素。

我母亲为各种妇女协会安排好定期读物。她制定计划每个星期都去本地监狱探望犯人。多年以后，当她移居加利福尼亚时，她发现了一个贫穷的结核病医院，就把它作为自己喜爱的慈善事业和长期访问点了。在她去世数月以后的一次电影节的宴会上，一个侍者轻轻地踮足向我走来，在我耳边悄声说：“你要吃牛排吗？我替你换下橡皮鸡。”我表示非常高兴，他给我送来了鲜汁牛肉。那个夜晚真令人难以忘却。我起先以为他是个影迷，该向他道谢，却被谢绝了。

“只需告诉我一下，你母亲过得怎样就行。”他不假思索地说，并告诉我他是一位已治愈的老结核病患者，他永远不能忘记在他住院治疗期间，我母亲曾经去探望过他们。

我们家庭是充分自由的，人人都互相热爱，直至我们每个家庭成员各自独立以后，仍然一如既往。我记得，我们总是彼此呼名的。我比我的哥哥约翰·尼尔·里根晚2年多才进入这个家庭，这2岁之差在孩提时代格外明显。到我9岁的时候，我们已在芝加哥西部的好几个小镇里住过，也在芝加哥住过。我哥哥和我都出生于坦皮科。那时它只不过是个乡下小镇，和其他小镇一样，南北战争的大炮和堆成金字塔形的炮弹还残留在横过我家面前的青草葱翠的公园里。再往前就是铁路的轨道和车站。它们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简直令人无法抗拒。在一次外出探险中，我们兄弟俩从停在车站上的一列喷气待发的列车下爬过去。我们刚到那一边，列车便强烈地震动了一下，喘着粗气启动了。只要不让内莉看见，我们那种间不容发的危险游戏总是很顺当的。有一次被她瞧见了，她在厨房里急得险些瘫倒。还有一次，正当我们

从冰车上敲下冰块（这是我们那天为自己定下的任务）的时候，给她抓住了。我们被揪着耳朵扭回家去。

这一年，我们又迁到了芝加哥的南部，靠近大学校园区。尼尔和我，没过多久便闯下了一桩不可避免的祸事。那一次，正逢杰克外出工作，内莉也不在家，履行她的定期慈善旅行去了。黄昏降临时，我们惧怕极了，便小心翼翼地吹熄了煤气灯，出门去城里寻找父母亲。我们没有找到父母，却与一个好心的醉汉争执起来，他认为我们不该这么晚跑到外面来。这时正好内莉赶到，她也同意醉汉的意见。当时她几乎失去了理智，因为她回家时发现，满屋子都是煤气味道，而两个孩子却无影无踪。所以，当杰克狠揍我们的时候，她也站在一旁，大发脾气，活像一位愤怒的正义女神。

我们从芝加哥移居到伊利诺斯州的盖尔斯堡，那郁郁葱葱的大树和深红色砖块铺砌的街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构成一派色彩绚丽的和乐景象，犹如一幅大自然的平版画。在我的脑海里印满了一整套立体的景致——发端于坦皮科，我可以根据需要使它们在我的记忆里前后挪动，就像我们在客厅里放录像时常做的那样。在盖尔斯堡，我们一改在芝加哥住公寓套间时的生活习惯，住进了有游廊的平房，最终搬进了一幢租来的带有阁楼的房子。这里，我偶然碰到了被人遗忘的为数众多的鸟蛋和蝴蝶的收藏品。这些玩艺儿的颜色和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脆弱，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它们是户外生活的象征，我由此开始问津这一神秘的天地。在这阁楼的发霉尘埃中，我第一次嗅到了山巅上的风，看到了在风雨中摇曳的松针，以及在荒地上旭日东升的景象。

我可以在那迷人的阁楼上连坐几个小时，~~眺望这些由~~

玻璃器具装着的收藏品——它们都是我们租住的这所房子的神秘房东储藏在那里的财富。对我来说，这所房子大得吓人。穿过街道，在那正对面，我们的邻居和朋友麦高恩斯和坦纳莱斯两家之间，是一片开阔空地，内有一排成荫的白杨树。这里还是一片原野，你甚至可以找到闪闪发亮的翡翠绿色的青草蛇。许多年以后，我怀着虔诚的心情重游故地，那所房子的面积已大大缩小了，而那片空地则成了宽度不足60英尺的小块地皮。

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了战幕，就是一个5岁小孩也能感受到当时令人兴奋的气氛。有一天，我知道杰克第一个去报名应征了，但有两个孩子的父亲是不准服役的。他常常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是两次战争之间的一代——西班牙—美国战争时期，他年龄还小；而现在“跨洋过海”时又年龄太大了。不过我坐在尼尔的那辆旧自行车上时，还不懂得他的渴望，那车子放在屋子前面的车棚里。我比杰克善于选准时间。因为每天中午，他回家吃饭时，我总是坐在车子上，他就会带我上街兜几个令人开心的圈子。虽然我从未要求他这么做，可他似乎很能揣摩出我的心意。

在我还不到5岁、尚未上学时，我已学会阅读了。这并非说我有什么天才，而只是因为母亲每晚都要安排时间，坐下来用手指指着一个个字，读给我们听，我们则趴在她的肩膀上看着。一天傍晚，报纸上的那些好玩的黑色符号，都被我叽叽咕咕地一字不错地读了出来。当时，我手持晚报，躺在地板上，杰克问我在搞什么名堂。我如实相告：“读报哩！”他说：“不错。读些什么？给我听听。”我照做了。内莉非常自豪，迫不及待地去告诉邻居，并请他们进屋，听

我得意地朗诵时事报道中关于一颗炸弹在一次游行期间于旧金山爆炸的后果以及新泽西州那损失4000万美元并两人死亡的“黑汤姆”爆炸案的令人激动的细节，等等。

读完小学一年级以后不久（那时没有幼儿园），我们又搬家了，这次是到蒙毛斯，大约住了一两年。我们在蒙毛斯学院附近租了一所房子。那儿是风景区，有美丽的山，在伊利诺斯州内，是相当出名的地方。在这些山丘，夏天可以散步，冬日可以滑乘雪橇。我7岁那年，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日的来临：游行啊、火炬啊、乐队啊、高声欢呼和饮酒作乐，还有那焚烧威廉皇帝的模拟像。这一切使我在心中产生了一种对我身外那个世界的特殊情感。那一年，正盛行可怕的流感，它使我深信除我的父母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力量。内莉患了感冒，就同许多的邻居们一样，不过她幸存下来了。我一直以为，她的恢复实在是一个奇迹（在当时，感冒就像中世纪的淋巴腺鼠疫一样令人恐惧），与其说是我父亲向教堂奉献蜡烛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因为使用了一种在尚未发明青霉素的当时的土方。一位脾气极坏的年迈的家庭医生，在她身上使出了浑身解数以后，竟作出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医嘱：“让她服用发霉的陈奶酪，奶酪越霉越好。”

当母亲时好时坏、最后终于康复以后，我们又迁居了。我父亲重新回到了坦皮科，找到了一个在百货店里任经理的好职业。我们是在我的生活中最走运的转折时刻搬迁的。我开始了像哈克·芬——汤姆·索耶^①所过的那种难得的田园

^① Huck Finn, Tom Sawyer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汤姆·索耶历险记》中的主要人物。